



# 第一章

## 20世纪的美国社会与美国文学

### 1. 20世纪初的美国文学（1900—1920）

1900年美国人口为7,600万，农村人口占2/3。半个世纪以后的美国面貌殊异，人口倍增为1.5亿，城市人口上升为人口总数的64%，有了全国性的铁路、公路网，汽车工业迅猛发展，数量达4,400多万辆。城市的兴起，交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美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及资本的集中。1904年全美国已形成了318个托拉斯，它们拥有70亿美元的资本，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命脉。垄断资本集团的形成把广大劳动人民推向了贫困的深渊，1%的家庭拥有美国7/8的财富，而99%的家庭却只有1/8的财富。劳动人民，尤其是广大欧洲移民及大批童工遭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境遇十分悲惨。在此情况下，一个要求改革的高潮席卷全国。美国各个阶层，美国知识界人士、政府中开明人士、中小资产阶级，各行各业纷纷卷入。

20世纪初的美国文学、报界杂志反映了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揭露了资本家残酷剥削人民的狰狞面目。

美国出现了一批专门揭露内幕的报道者（muckrakers）。这些报道者均为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他们将自己在贫民窟及厂矿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刊登在一些杂志上。这些杂志是：《大众》（*Everybody's*），《麦克鲁尔》（*McClure's*），《独立者》（*The Independent*）。这一时期比较引人注目的有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1904）；林肯·斯泰芬斯（*Lincoln Steffens*）写了多篇揭露性质的文章，被收入《城市的耻辱》（*The Shame of the Cities*, 1904）一书中。



《屠场》(*The Jungle*, 1906)是20世纪初一部重要的揭露性小说,是作者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根据他在屠宰场亲眼所见的情况写成的。在书中作者无情地揭露了屠宰场中恶劣的工作条件,深表同情地描写了工人的悲惨生活。该书的出版在社会各界引起很大震动。美国联邦政府派出调查人员,调查书上所述是否属实、可信。调查结果说明实际情况远比书中所写的更令人震惊。

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的“欲望三部曲”:《金融家》(*The Financier*, 1912),《巨人》(*The Titan*, 1914),《斯多噶》(*The Stoic*, 1947)是一部投机资本家的兴衰史。主人公弗兰克·考珀伍德是以一个名为约克斯的金融家为原型的。小说充分揭露了资本家投机取巧、尔虞我诈的罪恶本性。另一部反映这个时代特点的重要著作是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的《章鱼》(*The Octopus*, 1901)。这部小说以美国加州农场主与太平洋西南沿岸铁路托拉斯的斗争为背景。在小说中作家把拥有铁路的垄断资本家描绘得像章鱼似的伸出众多的触须,牢牢控制了铁路沿线农场主的命运。铁路控制了一切:农场主的土地、地方银行、铁路运输价格、银行贷款和利息等。铁路资本家为了收回已被农场主改良的土地把许多人逼得家破人亡。书的第八章交替描写了两个场面:一个是太平洋西南铁路副主席家里举行的酒宴;另一个是被铁路资本家逼得失去土地和家园的胡芬太太带着孙女迷了路倒地而死。《深渊》(*The Pit*)是《章鱼》的续集,是“小麦三部曲”的第二部。它介绍了麦子收获以后芝加哥粮食交易所的资本家做投机买卖的情况。

杰克·伦敦(Jack London)也是一个揭露社会弊端的作家。他在《铁蹄》(*The Iron Heel*, 1908)一书中设想了垄断资本统治美国后压制民主的情景以及改良主义者可能遇到的灾难。他还写了反映英国伦敦贫民生活的《深渊中的人们》(*The People of the Abyss*, 1903)。杰克·伦敦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半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Martin Eden*, 1909)以及描写与自然界作斗争的小说,如《荒野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 1903)。《荒野的呼唤》描写了生活在加拿大北部与自然环境作斗争的淘金者,也以大量篇幅描写了淘金者的伴侣大狗与群狗斗争,逃入原始森林的故事。

美国文学在20世纪初的另一个重要题材是人们对小城镇生活的狭隘、贫



乏所表露出的厌恶情绪，即所谓“乡村的反叛”（Revolt from the Village）。这些小说批判了小城镇生活的单调沉闷，那里人们思想的狭隘和无知以及他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埃德加·李·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的《匙河集》（*Spoon River Anthology*, 1915）、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的《雕塑家的葬礼》（“The Sculptor’s Funeral”, 1905）都属此列。凯瑟的小说《我的安东妮亚》（*My Antonia*, 1918）、《我们中之一》（*One of Ours*, 1922）及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的《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Winesburg, Ohio*, 1919）都多少有这种成分。

这个时期美国文学还有一些其他题材。有描写大城市生活的，如《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 1900）；有描写人物心理的，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最后三部长篇小说；有描写旧纽约没落贵族生活的，如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轻浮世界》（*The House of Mirth*, 1905）。在诗歌方面，有受欧洲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意象派（Imagists），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抒情哲理诗及戏剧独白诗，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所写的关于芝加哥生活的诗（他是“芝加哥文艺复兴”的主要诗人之一），还有T. S. 艾略特（T. S. Eliot）早期的诗歌。1912年创刊的《诗歌》（*Poetry*）杂志专门刊登上述诗歌。这个时期的美国文学，尤其是小说主要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的观念与技巧。

## 2.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文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中立政策，想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向欧洲交战双方出售原料和武器，但战争爆发几个月后，由于英国的海上政策，美国对德贸易被迫中断，从此美国向英法等国出售的物资数量急剧增长。当时美国广大人民由于血统、教育和经济等原因在感情上倾向英法。1915年英国大型客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被德国击沉一事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掀起一个反德高潮。1917年3月德国又击沉三艘美国船。一个月以后美国政府正式向轴心国宣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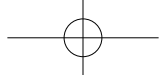
从此美国就卷入了一场不光彩的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但威尔逊总统却



给美国的参战披上了一件理想主义的外衣，宣称这是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是一场“捍卫世界民主”的战争。许多美国青年轻信了这些宣传，纷纷应召，离开家乡，奔赴前线。战争中他们许多人作出了无谓的牺牲；还有不少青年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以后充分认识到了这场战争的真相和本质，对战争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对一切事物持怀疑态度，感到生命短暂，前途渺茫，试图以享乐掩盖内心的空虚。“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的作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指的是以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E. E. 肯明斯（E. E. Cummings）、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和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等为代表的一些作家的统称。这些作家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大战一开始时多为20岁左右的青年，到过前线。战争的罪恶使他们的幻想破灭，战后有不少人漂泊在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他们的创作颇受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他们一方面消极悲观、失望“迷惘”，另一方面对当时美国遗留下来的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思想、更早的清教徒思想残余以及一系列虚伪和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批判。这些作家的特点，尤其是他们的怀疑、空虚、悲观失望的情绪被人们概括为“现代人的情绪”（the modern temper）。

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没有去前线打过仗，但在伦敦写的诗《休·赛尔温·莫伯利：生活与接触》（*Hugh Selwyn Mauberley: Life and Contacts*）也以战争为题材。诗的第四段和第五段写入伍青年怀着不同的动机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发现自己听信了谎言，蒙受了欺骗。庞德感慨地写道：“他们中的无数人死去了/其中不乏才华横溢的青年/为的是一个老掉了牙的泼妇（指西方文明）/为的是一个分崩离析、支离破碎的文明/……为的是二百多个破碎的塑像/为的是几千本旧书”，这些诗句集中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一代青年作家的反战情绪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E. E. 肯明斯参加了法国救护车队，因批评法国当局的官僚主义而被法国政府监禁，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干预下才获释。他的自传体小说《巨大的房间》（*The Enormous Room*, 1922）真实描写了他被关押的情况。肯明斯诗歌的反战情绪也很强烈：“你听/我说/你懂我的意思当/一个士兵倒下去你知道/大家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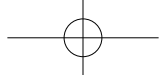
神上恐慌的滋味或者/当他们投来几颗毒气弹/和榴霰弹的碎片/或者我的脚冻得渐渐失去知觉……”

海明威曾跟随法、意救护车队及红十字会去过前线，目睹了那里士兵伤亡的惨状。海明威自己也受过伤，腿部嵌进的碎弹片有200处之多。卡波雷托战役（Caporetto Battle）中60多万意大利官兵抵挡不住德奥军队的炮火纷纷缴械投降或逃离战场。在《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 1929）这部小说中，海明威描述了这次战役中的混乱情景。小说的题目就充分反映了他厌恶战争的情绪。书中主人公亨利在独白中说：“我一听到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就觉得害臊”，“我可是没有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这是对那些煽动性的战争宣传极大的讽刺。海明威的另一部小说《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1926）写的则是战争给一些年轻人迈克、比尔、杰克、布莱特心灵上造成的伤痕。主人公杰克·巴恩斯爱上了布莱特，但因在战场上受了伤，失去了性功能无法与她结合而痛苦万分。这些年轻人成群结伴在欧洲漂泊游荡，以恣情享乐的方式填补精神上的空虚，解脱他们心灵上的创伤及烦恼。

多斯·帕索斯的小说《一九一九年》（*Nineteen-Nineteen*, 1932）中的五个美国士兵在意大利前线读到报上阿比西尼亚女王逝世的消息后借口为女王“守灵”喝得酩酊大醉，敌机当时正在附近轰炸，他们一边狂饮，一边唱着“德国、德国至上……”的歌曲。多斯·帕索斯曾因这样的经历而被遣送回美国。《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 1921）是多斯·帕索斯写的另一部战争小说。小说叙述了三个美国士兵的经历。这三个士兵的出身、性格、兴趣、职业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倔强、从不唯命是从。他们的性格给他们带来了不幸的结局。在小说中作者把士兵比作送进机器中加工的原料，不顺从、敢于反抗就会被机器轮子碾得粉碎，从而谴责了军队对个性的摧残。

综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青年作家对席卷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持反抗态度。

当然，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有采取与此截然不同的态度的。阿伦·西格（Alan Seeger）所写的诗歌《我与死亡有约会》（*I Have a Rendezvous with Death*, 1916）就是站在官方立场上歌颂光荣牺牲、美化战争的作品，而且曾风靡一时。伊迪丝·华顿所写的《马尼战场》（*The Marne*, 1918）则是为美国



政府辩解，把美国参战的目的说成是为了挽救西方文明。凯瑟的小说《我们中之一》描写了一个理想化的战争环境，主人公克劳德怀着挽救西方文明的信念去参加战争而且至死不悟。当然这些毕竟都不属于美国战争文学的主流。

### 3.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文学

####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及拜金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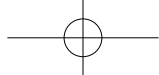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各国经济陷于瘫痪状态，而美国由于参战时间短、损失少，战后经济非但没受战争影响，反而进入了发展高潮。美国企业高效率的管理制度、标准的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率，提高了工人工资，加之广告、推销员、分期付款等促进消费和购买力的措施，美国人民购买力普遍提高。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痛苦回忆逐步被购买汽车，购买家庭电器设备，追求物质享受的浪潮所冲淡、替代。1923年底，美国城市里2/3的家庭有了汽车。<sup>1</sup>

“美国之梦”变成了金钱之梦，许多人都走上经商发财的道路，发财致富成了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拜金主义之风弥漫全国。各大学纷纷开设商业课程，设置商学院以顺应商业发展的形势。

多斯·帕索斯的小说《赚大钱》(*The Big Money*, 1936)就反映了拜金主义的欲望和潮流。查里·安德森原来是大战中的一个飞行员，后来进了飞机工业，成了富翁。金钱的腐蚀致使他终日酗酒，终于因酒后开车而死于车祸。玛格·道林出身寒门，以后一跃而成了好莱坞明星。有声电影的出现使玛格·道林无法发挥他原有的特长，转眼间无声无臭。查里·安德森与玛格·道林财运亨通之时也就是他们身败名裂之日。这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梦的真实写照。

凯瑟在《教授的住宅》(*The Professor's House*, 1925)及《冤家》(*My*

1 原文见 Frederick Lewis Allen 著 *Only Yesterda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31年版, 第136页。



*Mortal Enemy*, 1926) 中痛斥了拜金主义和对物质的狂热追求, 指出金钱对人的腐蚀作用。《冤家》的主人公迈拉·亨萧因与一个普通青年成婚而失去了财产继承权。天长日久她感到自己家庭经济状况远远比不上别人而后悔万分, 视丈夫为“冤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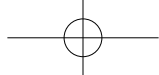
德莱塞的小说《美国的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 1925) 描述了一个出身卑微的年轻人在金钱至上的社会环境中为了与富家姑娘桑德拉结婚而视自己的未婚妻为绊脚石, 让她淹死在水里的故事。小说充分说明了是金钱和地位毒害了青年, 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1925) 反映了“美国之梦”的幻灭。主人公盖茨比以为脱离了穷困, 有了万贯家财就能夺回他曾爱过而被人占有的苔西, 而苔西是不可能放弃金钱和权势与盖茨比结合的, 因此盖茨比的美梦就成了一场悲剧。

“美国之梦”在18世纪法裔作家约翰·克雷夫科尔 (John De Crevecoeur) 的作品《一个美国农民的书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82) 及19世纪小说家霍雷肖·阿尔杰 (Horatio Alger) 的作品中都有反映。它给人以奋发向上的精神, 给人以必定能有所成就的信心。但到了20世纪美国许多作家已认清了“美国之梦”的本质。《美国的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1939) 等作品都以不同的背景, 从不同的角度宣告了“美国之梦”的破灭。

##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政治气氛与社会背景

在政治上,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压制民主思想、压制不同见解和“恐共”(Red Scare) 时期。极右翼的三K党重新抬头。他们的主要矛头对准黑人, 同时也反对犹太人、天主教徒、一切外国人 (aliens), 反对工会及罢工。由于贫富悬殊、失业率不断上升, 美国国内掀起了罢工浪潮, 美国的工会力量在斗争中日益增强, 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 给统治阶级以巨大的威胁。同时美国共产党的成立也给右翼势力带来恐惧和不安。他们害怕美国共产党扩大影响, 鼓动工人去瓦解和颠覆美国的社会制度。



对激进分子和进步势力的压制成了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其中反映萨柯和万泽蒂（Sacco and Vanzetti）一案的文学作品最为突出。

1920年两位意大利移民萨柯和万泽蒂被诬陷有杀人抢劫的罪行。知识界人士联名要求释放他们，当局对此置之不理，竟于1927年将两人处以极刑。迈克·戈尔德（Michael Gold）、多斯·帕索斯、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爱德纳·圣温生·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等作家因为要求释放他们而被捕，另有许多作家挥笔上阵，赋诗写剧。多斯·帕索斯的小说《赚大钱》就描写了许多工人和开明人士在两位意大利移民被害后在波士顿街头守夜的场面。据统计，介绍他们两人的诗歌共有144首，小说8部，剧本6部。

20年代的美国也是大城市犯罪率迅速上升的时期。《禁酒令》（1919-1933）的实施导致了全国性的走私和私制酒类。与此相关联的非法经营及犯罪活动波及餐馆、旅店、夜总会、妓院及赌场。一些个人和集团大发《禁酒令》之财，为此目的，他们敲诈勒索，贿赂收买政府官员及警方，要挟恐吓，无恶不作，互相之间勾心斗角，殴打残杀，十分猖獗。在《禁酒令》实施后的14年中，他们中势力最大的竟然控制着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旧金山等城市的经济和治安，大搞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通过贩卖私酒及其他非法活动致富的暴发户，只是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涉足非法之途而又遭厄运的浪漫主义者。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小说《圣殿》（*Sanctuary*, 1931）中描写了一个心理变态、无恶不作的私酒贩卖集团的头子。多斯·帕索斯的小说《曼哈顿中转站》（*Manhattan Transfer*, 1925）描写的人物有一个是靠贩卖私酒发财的水手。安妮塔·露丝（Anita Loos）的《绅士更爱金发女》（*Gentlemen Prefer Blondes*, 1926）中的女主人公在纽约举行盛大晚会庆祝初进社交界时，晚会上的酒水就来自私酒贩卖集团。负责审判违反《禁酒令》案的法官竟然也出席晚会，与私酒贩头子举杯共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名法官在第二天审理案件时仍酒兴正浓。有关《禁酒令》的小说直到1975年还继续问世，如威廉·肯尼迪（William Kennedy）的《杰克·戴蒙德》（*Legs*），小说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其中所写的杰克·戴蒙德是私酒贩头子。





### 对传统观念的反抗

美国经济的发展、家庭电器的普及使美国妇女逐步摆脱家务劳动，迈入社会，她们的职业范围从中小学教师、秘书扩展到医生、律师，其独立感及自豪感大为加强。更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斗争美国妇女在1920年争取到了选举权，政治地位大为改善。在婚姻恋爱方面，旧的维多利亚模式被抛弃，社会上出现了一场“道德与风俗习惯”的“革命”。未婚妇女与男子自由交往，坐上敞篷车去郊外兜风，自由出入餐厅、舞厅及剧院。后来西格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理论的盛行给美国年轻一代提供了理论根据，一些人作了简单的理解，从性欲压抑引发出了变态心理。

亨利·詹姆斯作品中的苔西·米勒在19世纪的意大利与当地一个男子的交往就是打破维多利亚传统惯例的一个例子，但遭到了当地美国人的强烈反对。菲茨杰拉德所著的《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 1920)中有对风靡一时的拥抱会的描写；有对男女青年恋爱的描写：“但这些讨男人喜欢的女人从16岁至22岁，每半年就订一次婚，……而且在与不同人订婚之间还不时穿插一些在月光下、炉火旁或黑夜中被其他男人……亲吻的多情片段。”<sup>1</sup>这里的描写不无讽刺与夸张，但也多少显示了“革命”的一角。

这个时期也常被人称为“爵士乐时代”(The Jazz Age)。原因是当时爵士乐流行很广，而且中上层阶级男女青年经常在家里举行晚会，随着爵士音乐跳舞、饮酒，喝醉后以争吵殴打结束。这样的场面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有生动的描写。它一方面反映了青年们的欢乐；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被欢乐所掩盖的迷惘、空虚及烦恼。这种类似的寻求刺激的场面在“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中，也十分突出。

### 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

19世纪后期西方科学和哲学的飞速发展，对传统宗教观念提出了前所未

1 原文见 F. Scott Fitzgerald 著 *This Side of Paradise*, New York: Scribner's, 1963 年版, 第 60 页。



有的挑战，这对打破西方传统观念、感情和习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弗洛伊德强调人的行为动机，主张如实宣泄感情的心理学观念和亨利·波格森（Henri Bergson）所提出的关于主、客观的时间概念，促进了文艺领域各种观念的改变。西方世界工业的高速发展、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社会的对立和人的孤独感。在文艺领域新的思潮应运而生。一种反对传统，表现作家对生活的新认识，追求内在自我表现和探索非传统形式的创作思想在一些作家中占上风，代替了19世纪后期注重人的外貌、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

现代主义文学发源于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民在心理上经受了剧烈的震动，年轻一代的理想被严酷的战争现实所破灭，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现代主义文学从诗歌开始深入到戏剧、小说等各方面，反映了战后美国人的心态。

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作是T. S.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 1922）。诗的题目指的是一片只见岩石不见水的荒原，它象征着战后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诗歌的第一句“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便反映了这一点。四月本应是大地回春，给世界带来生命和希望的时刻，但战后西方世界却像荒原一样枯竭死寂，因而即使是春天也只能使人回忆昔日的美景和欢乐，徒然增添了今日的不快。这首诗采用了现代主义段与段、行与行之间缺乏连续性的手法。

另一篇富有代表性的诗歌是前面已提及的《休·赛尔温·莫伯利：生活与接触》。这首诗讽刺和感叹了西方文明的崩溃。诗歌的头几章是一位自称E. P.的叙述者的独白。独白以讽刺的口吻叙述他如何想复兴已被弃置的诗歌，但“从开始就错了”，因为他生不逢时，他虽然爱好古典名著并想模仿他们进行创作，但“在半野蛮的国家里（指美国——编者注），他们只需要反映自身面貌的快速艺术产品，过去高雅的珍品如今已全被粗俗的便宜货取代了”。这首诗和《荒原》因为象征手段与数量众多的典故而不易被理解，这一点也是某些现代诗的一个特征。

威廉·卡罗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则相反，他也是现代派诗人，但他却提倡内容具体，反对抽象；提倡语言简单、口语化，反对艰涩难懂。他主张以生活中最平凡的东西（诸如碎瓶子、小推车、冰箱里的食品等）



作为诗歌的素材。威廉斯和E. E. 肯明斯都曾为改变传统诗歌的行列作过有益的尝试。肯明斯的诗歌虽然文字形式和排列有所创新，但内容上却无很多反传统之处。

美国戏剧过去成就不大，进入20世纪后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在题材和技巧上为美国戏剧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他的作品寻找自我，反映人类的孤独，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探索被压抑的性欲及其他变态性心理。在舞台技巧方面，奥尼尔也颇有创新。

在小说方面，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 1929）颇能反映现代主义对美国小说的影响，以意识流的手法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通过三个兄弟不同的内心独白及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客观讲述表现了一个南方贵族家庭的衰落及这家人的女儿的悲惨下场。多斯·帕索斯的小说《曼哈顿中转站》在作品《三个士兵》的基础上创造了一部人物众多、范围更大的群像小说，仅主要人物就有八个。这些人物有的彼此有关，有的互不相干。为了同时表现他们的生活，多斯·帕索斯把每人的生活分成若干片段，相互穿插，打破了传统小说的连续性，故事突然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这部小说是纽约各阶层人民的万花筒和缩影，既让人看到纽约生活五光十色的繁华表面，又让人看到隐藏在后面的空虚实质。

福克纳和多斯·帕索斯在内容及技巧方面都有一定典型性。海明威的小说内容反战，语言口语化、含蓄（understatement），其风格为英语世界很多作者效仿。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模仿了英国现代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印象主义，因此别具一格。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虽然技巧上没有革新，但其作品《大街》（*Main Street*, 1920）、《巴比特》（*Babbitt*, 1922）以讽刺中西部小城镇的物质主义、狭隘心理，讽刺中西部城市资本家自鸣得意，缺乏主见，随波逐流而与众不同。凯瑟则以其既描写移民拓荒者，又写批判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传统题材，在技巧上既重视文字的洗练又在小说结构、叙述角度方面进行大胆试验而获得了好评。20世纪初这段时期美国文学因其题材之丰富、内容之新颖、技巧之大胆创新，被人称之为美国文学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或美国文学的“第二个文艺复兴时期”。

这个时期南方文学、纽约哈莱姆区的黑人文学由于作品数量空前且优秀



作品多而有了“南方文艺复兴”（Southern Renaissance）及“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的说法。

#### 4.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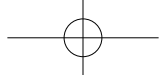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的表面繁荣掩盖了其社会矛盾，孕育着一场经济危机。1929年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倒闭，一场从美国开始、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持续10年之久的经济危机就此开始了。它是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历的最严重、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危机。及至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美国全国银行都基本停业，失业人数超过1,300万。罗斯福的“新政”虽小有成效，仍未能根本解决问题。这次危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才得以摆脱。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美国作家的民族意识和责任感大大增强。随着危机的持续，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由不满到丧失信心，激进情绪甚为普遍。

1932年《现代月刊》（*The Modern Journal*）刊登了17位美国作家答编辑部向他们提出的两个问题：资本主义是否注定要在美国灭亡；作家是否应在这场危机中采取行动。他们中的大部人，包括一些保守作家，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一些作家深入厂矿、农村，写出了许多内容动人的报告文学。

这个时期的多数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记载或报道了经济危机时期美国人民所经受的贫困与失业的痛苦，抨击了美国的社会及经济制度。这类文学作品有：内森·阿施（Nathan Asch）的《大路：寻找美国》（*The Road: In Search of America*, 1937），舍伍德·安德森的《迷惑不解的美国》（*Puzzled America*, 1935），西奥多·德莱塞的《悲惨的美国》（*Tragic America*, 1931），路易斯·阿达米克（Louis Adamic）的《我的美国》（*My America*, 1938），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美国的地震》（*The American Earthquake*, 1958）及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的《让我们现在颂扬著名的人物》（*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 1941），等等。

小说家罗伯特·坎德威尔（Robert Cantwell）在他的作品《富裕之国》（*The Land of Plenty*, 1934）中介绍了经济危机年代里美国西北部木材加工厂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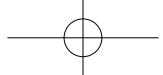


人的大罢工。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的小说《胜负未决的战斗》(*In Dubious Battle*, 1936) 叙述了加州农业工人的罢工斗争。1935年上演的两部戏剧: 克利福德·奥德兹 (Clifford Odets) 的《等待老左》(*Waiting for Lefty*) 及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 (Archibald MacLeish) 的《恐慌》(*Panic*) 分别表现了30年代出租汽车工人大罢工及象征着资本主义世界崩溃的资本家的破产与自杀。《等待老左》演出时当剧中的老左被公司雇佣的凶手打死时, 工人喊着, “要罢工!”, 台下观众也应声大喊着, “要罢工!”, 场面十分动人。<sup>1</sup>也有一些作品对贫苦人民表现了极大同情, 但常常带有悲观失望的情绪, 如迈克·戈尔德 (Michael Gold) 的《没有钱的犹太人》(*Jews Without Money*, 1930), 厄斯金·考德威尔 (Erskine Caldwell) 写南部佃农贫困生活的小说《烟草路》(*Tobacco Road*, 1932), 詹姆斯·法雷尔 (James Farrell) 的《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 (“*Studs Lonigan*” *Trilogy*, 1932–1935), 亨利·罗斯 (Henry Roth) 的《犹如睡梦》(*Call It Sleep*, 1934), 多斯·帕索斯的《美国》(*U. S. A.*, 1937) 等。

1939年斯坦贝克所写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被许多评论家看作是经济萧条年代的代表作。此书叙述了流动农业工人所受的剥削与压迫。1933至1935年美国大平原的“灰盆”(Dust Bowl) 地区连续三年干旱, 庄稼颗粒无收, 许多破产的佃农离乡背井去加州当农业工人。书中所写的就是这些人的悲惨遭遇。书的第25章控诉了农场主为抬高价格毁掉过剩的农产品的场面: 柑橘被一卡车一卡车地倒在地上, 浇上煤油; 土豆被倒在河里; 玉米被烧; 活猪被宰后倒上生石灰等, 作家描写得十分真实, 令人感到无比气愤。

30年代也有一些回避现实, 描写古代与异国风光, 带有浪漫主义或较浓伤感色彩的小说。其中轰动一时的小说有《飘》(*Gone with the Wind*, 1936) 及赛珍珠 (Pearl S. Buck) 的《大地》(*The Good Earth*, 1931)。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 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占上风。

1 原文见 Malcolm Cowley 著 *The Dream of the Golden Mountain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1 年版, 第 258 页。



## 5. 20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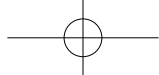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对外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国家恢复经济，并与他们签订军事性的安全条约，建立军事同盟。在国内，通过“循规蹈矩”（the age of conformity）的政策，实行麦卡锡主义，迫害进步人士，掀起反共高潮。上至政府部门，下至文化名人、历史学家、好莱坞影星等许多人士被监禁，甚至被诬陷处以极刑。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是南方作家、犹太作家及黑人作家的作品。南方作家多半受福克纳及南方传统的影响。他们的作品故事离奇，充满暴力，人物多有变态心理，表现手法往往是哥特式的。这些作家除福克纳外，有老作家如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比较突出的新作家有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及两位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和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

在犹太作家中，主要有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J. D.塞林格（J. D. Salinger）、索尔·贝娄（Saul Bellow）、艾萨克·巴什维茨·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等。他们写犹太性格、犹太文化、犹太人的价值观、犹太知识分子的内心苦恼，各人的写法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犹太意识也不同，但不是所有犹太作家都把自己局限于犹太题材。

黑人作家除了老作家詹姆斯·兰斯顿·休斯（James Langston Hughes）和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外，最突出的是新作家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及詹姆斯·鲍得温（James Baldwin）。与鲍得温、赖特相比，埃利森虽也在白人世界中寻找黑人的自我，但没有那种对白人的强烈仇恨与暴力。

这段时期直至70年代有从不同角度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有从军官角度以传统战争观念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如詹姆斯·古尔德·科普斯（James Gould Cozzens）的《仪仗队》（*Guard of Honor*, 1948），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的《凯恩号兵变》（*The Caine Mutiny*, 1951）以及《战争风云》（*The Winds of War*, 1971），也有写战争的残酷，军官的武断、无能、残暴的，如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 1948）及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的《从这里到永恒》（*From Here to Eternity*, 1951）。他们



的写作手法有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也有超现实主义的，如约翰·霍克斯（John Hawkes）的《食人者》（*The Cannibal*, 1949）。

这一时期两位最引人注目的戏剧家是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和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 1944）被誉为开创西方戏剧史的新篇章，他的《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1947）及第三部作品《热铁皮屋顶上的猫》（*Cat on a Hot Tin Roof*, 1955）均获普利策奖。威廉斯大部分作品有哥特式成分。主要人物不是畸形就是有变态心理。米勒是纽约作家，他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 1949）得到高度评价。他一般写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与冲突。

20世纪40年代还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诗人，但他们的文学造诣不如30年代的诗人。这个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有黑山派的代表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自白派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和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擅长写花草的西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以观察力敏锐著称的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以日常生活之单调为主题的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等。除了这些白人作家还有一位黑人诗人格温德琳·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

到了60年代，随着美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的发展以及越南战争，文坛上一代新人——其中不少是少数民族作家及女作家——不断涌现、成长。这时期的美国文学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创作技巧方面都经历了一次新的繁荣和复兴。